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百家争鸣】	总政治部“被军管”是林彪体系内部较量的结果	文 贝
【史实辨析】	文革期间总政没有被军管过吗？	余汝信·曾 鸣
【史海钩沉】	把文革中的农民记入历史	徐 星
【拒绝遗忘】	清华武斗期间的两件亲历事	高晋占
【难忘岁月】	5·30难以忘怀的碎片记忆	高子正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百家争鸣】

总政治部“被军管”是林彪体系内部较量的结果

• 文 贝 •

◇ 概念化的“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

1968年10月“毛泽东亲自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来自于余汝信《是谁下令军管总政》一文。此后，很多文章都引用了这一说法。

余汝信被很多人称之为文革史的研究者，而且在海外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提出的总政治部被军管并不是事实，也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余汝信的说法主要依据有三个。

一个是1984年5月3日由徐才厚主编的《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70—71）。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总政治部即很难正常履行职责。1967年7月25日，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企图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搞垮。11月21日，以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次年10月，又对总政治部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第二个是《李德生回忆录》。文中提到：“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389）

第三个是余汝信访问时任总政军管小组副组长刘江亭记录（2002年9月13、14日）。据余汝信讲“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

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事隔多年，刘还记得其大意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透露，命令是10月18日下达的。”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徐才厚主编的《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还是《李德生回忆录》，在“军事管制”一词中都加了引号，说明这一用词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而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

刘江亭的回忆是否准确无从考究，但余汝信却据此得出结论“一言以蔽之，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

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而且这个史料一定是具有权威性的，不能道听途说。就军管总政治部而言，既然提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必须把文件的原文编号注明。一面讲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一面又讲是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就文革期间中央文件而言，要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合发文，要不是以毛主席指示。“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说从来没有过。

没有出处的所谓文件，很难成为使用者价值判断的依据。即使一些所谓的文献资料，也要分清真假，或者有没有漏洞。事实上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都是这些写手们操刀，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观点，然而再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引用。包括一些所谓的文献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改编，有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浓缩成概要，有的甚至编造没有来源的文献。

比如由海外学者宋永毅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号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献和异端思潮重要原始文献，其中伪造了一份196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这个所谓的指示可以说闻所未闻，连个发文编号都没有。内中的许多提法都是台湾用法，明显是台湾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制造混乱而伪造的。编纂者却“以讹传讹”，当作正式文献堂而皇之地录入。

余汝信之所以编造出一个“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源于他的固有观念，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

◇ 文革期间军队组织架构

搞清文革期间是否存在总政治部被军管，首先要了解新中国军队组织架构中的几个机构设置和背景和职权范围。

军委办事机构

中央军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根据不同时期，曾下设过军委办公厅（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成员组成）、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事组。在当时的组织结构中，中央军委的层次是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副主席（几乎全由元帅担任）、军委常委、军委委员四个层次。这种组成与后来的军委主席、副主席、常委并直接领导下的四总部中间多了一个办事机构的层次。

1954年9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机构为军委办公厅，处理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任副秘书长。

1959年庐山会议后，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大将、谭政大将、杨成武上将（副总参谋长）、萧华上将、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部长）、萧向荣中将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增补萧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0年5月，增补张爱萍上将（副总参谋长）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同年9月底，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10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1968年3月由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1969年4月，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此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70年又增加了汪东兴、纪登奎、张才千、陈士榘。一个军委办事组汇集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可见其规格之高。由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人数占优，谢富治、李德生、汪东兴、纪登奎、张才千、陈士榘等被说成是“掺沙子”，这种说法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

1971年10月，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包括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纪登奎、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汪东兴。

很多文章对当年的军委办事组提出了诸如没有元帅参加，架空军委，权力极大等问题，其实是不了解军队的组织结构。

军委办事组的职责是“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这是一个办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而且仅限于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帅们都担任军委副主席，属于领导层。军委办事组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不同于军委办公会议。如果让老帅进入军委办事组则是降格使用，因为军委办事组是在军委主席副主席以及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只是中共九大后军委不设军委常委、秘书长和办公会议，客观上军委办事组的职责扩大。

军委办事组只是中央军委属下的办事机构，有协调权却没有直接指挥权，只是按照中央军委或军委首长的命令落实工作。因此，由它发出的所有指令或工作指导有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有的以三总部的名义下达，很少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下发文件。

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并不像后来埋汰的那样只是斗争的工具，而是在中央和军委的指挥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调动部队平息武斗，安排军队人员参加支左，调解军队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处理社会重大事件，完成战备工作，组织国防军工生产和科研。

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

1966年5月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时，组长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担任。关于刘志坚在文革前期的表现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坚持军队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尽力维稳。另一种说法是没有与林彪稳定军队的态度保持一致，与他的接班人总政宣传部长谢镗忠一起，思想极左，在军队内搞揪“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军队院校师生搞“四大”和军内夺权。同时，他支持当时保刘少奇的红卫兵一司和二司（女儿在一司），支持刘少奇的工作组，和中央文革另一重要人物王任重一样打成了刘邓派。

1967年1月12日，新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是徐向前，顾问是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青、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包括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和谷岩、张清。顾问江青。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徐向前担任的军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在位置上比刘志坚时期高很多。刘志坚时期全军文革小组隶属于总政治部，徐向前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成为中央军委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办事机构。

徐向前贵为元帅，由于出身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军内长期以来并无实权，只是负责民兵工作。上任伊始，首先宣布由江青出任全军文革顾问。

1967年1月15日，徐向前、萧华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姚文元同志批评我们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地方落后了三个月。我认为这估计非常准确，而且这个批评是我们的动力。”

1967年1月17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何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后来语境中的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师们对林彪及中央文革的对抗，其实是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与军委副主席兼文革组长徐向前，为了造反派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而对拍桌子，据说叶剑英用力过猛导致一小指骨折。王力等人向林彪汇报“二月逆流”时，林彪针对徐向前说了一句话“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页982）就当时而言，徐向前和叶剑英虽然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叶剑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位置在徐向前之上。

1967年2月1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谈话时说：“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

由于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活动引起了当时人气很高的两大元帅林彪和叶剑英的不满，1967年4月以后，军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担任。徐向前最后被批是因为武汉“七二〇事件”，他批准了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酿成了一场大祸，不得不做检查。

1967年4月开始由萧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工作。

萧华在军内以才子著称，17岁任少共师政委。抗战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解放战争时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建国后新中国成立后，萧华在罗荣桓去世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是1955年最年轻的上将（时年39岁）。他1965年领衔创作的《长征组歌》成为历史经典。

接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萧华其实远比刘志坚和徐向前更左。当年反彭德怀有他（揭发58年随彭德怀带队的军事代表团访苏时有里通外国之嫌），反罗瑞卿他是先锋（他与叶剑英、杨成武揭批罗瑞卿的报告当时以中央文件附件下发。在1965年军委办公会议上由于指责大比武与杨德志、杨勇、张宗逊等公开吵了起来）。

在很多老将军的评价里，萧华年青有为，既是儒将又不是东西。皆因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历次运动中总是冲锋在前，包括反彭德怀、反罗瑞卿。批刘邓，整段苏权、逮钟伟。反林彪，反四人帮。

萧华是林彪得力嫡系将领之一（还有刘亚楼、杨成武），由于极左树敌太多引起众怒。当年在山东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曾经被伪军俘虏，后又获救的所谓“变节”材料被红卫兵揭发。本人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抓到把柄。这些都是最终导致萧华倒台的原因。

1967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讨论了萧华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文化大革命前整了一批高级干部，总部军兵种各军区都有，他们整到哪里，那的领导班子就不团结。2、文化大革命中整人。3、军队并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全军文革仿效地方打倒刘少奇的方法，搞神秘化活动，扶植一派人揪人武斗。（见邱会作回忆录页138—139）

1967年12月，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央。萧华随之倒台，同时受牵联的还有总政包括副主任在内及各部级一大批干部。

即使如此，林彪对萧华仍然爱护有加。不许中央专案组将他关进秦城监狱，而是放在了北京卫戍区，以致其夫人到处找不到萧华。

1967年8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文革领导小组基本名存实亡，工作由军委办事组取代。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显然，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刘志坚、徐向前、萧华以及后来的黄永胜等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行为虽然属于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作为职务行为情非得已。但许多做法仍然存在个人缺陷，应当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 文革中的总政治部问题并不简单

总政治部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全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

文革中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治部内部造反；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要他们‘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5月，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违反周总理提出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要联合演出的要求，支持一派演出，挑起武斗事件，诬陷总政领导是黑后台。到了7月25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一些干事也成了‘小鬼’。使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从此瘫痪。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李德生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总政治部文革中的真实面貌。

总政治部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与国家政治形势结合较紧密。在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情况下，身在其中的领导干部势必在运动中沉浮。但是，每一位领导的沉浮都有具体原因。

梁必业属于第四野战军体系，1960年至1966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被打成“罗（瑞卿）梁反党集团”，在文革前就被打倒。

刘志坚出身于第二野战军，1957年由总政宣传部长升任副主任。他是因为跟随了刘邓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前期活动而被打倒。

徐立清出身于第一野战军，1966年5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的1967年1月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军委文革七位副组长之一，他是1968年1月受萧华牵连一起被打倒的。

袁子钦出身于华北军区，他的被打倒直接诱因是徐向前关于批评萧华的讲话被其泄露给造反派，造成萧华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抄了家。他在1968年2月23日因病去世，迫害一说值得商榷。

傅钟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就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谭政任总政主任时，就曾因“宗派主义”受到冲击。文革时在批萧华“总政阎王殿”时受到牵联，但因时年近七十年休养，基本没有受到迫害。

显然，萧华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主管军委文革小组期间的活动，对“总政阎王殿”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其实萧华在徐向前担任组长时就是文革积极分子。1967年1月6日，萧华讲话：“在总政治部揪出了梁必业，现在又揪出了刘志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揪出了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长，1980年担任总政副主任）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显然萧华是支持总政内部造反的，而且打倒梁必业、刘志坚和史进前都有他的“功劳”。

1967年1月1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对萧华作了若干批评。休会时徐向前宣布：这个会没有结束，不准向下传达。然而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当晚就将会议

情况告诉了在红卫兵组织中当头头的儿子，第二天北京城里就出现了批萧华的大字报，接着北京军区的人抄了萧华的家。为些周恩来说：“杨勇不斗刘志坚，却搞萧华，杨勇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而且次月经毛泽东批准，萧华与谢富治、杨成武、粟裕一道被增补为军委常委。

◇ 总政治部被冠以“阎王殿”缘于“5·13事件”

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按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却成了萧华被打倒的导火索。

当时解放军总部机关及院校及文艺团体分为两派，一派为有萧华、杨成武支持的势力占优的“冲派”，在当时是造反派。另一派受林彪支持的“三军党委”，主要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属于保守派。

1967年4月，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

5月13日演出时，“冲派”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击演出，发生了武斗。卫戍区部队把冲击会场的一派赶走了。此次冲击双方共伤50多人。

6月9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等在人大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此举表示了中央对“老三军”的支持，也使萧华支持的“新三军”失势。此事后来被许多人称之为林彪集团掌控军队文革的分水岭，也是萧华失势的开始。

江青事后对此过程有一段讲话：“解决萧华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萧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江青口中的“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指的是萧华私生活上的问题。（《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指示》，见《江青文选》）

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此后，对总政治部的整顿涉及了许多人。由于许多主要领导被停职审查，总政治部的工作陷入几近瘫痪状态。

◇ 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介入总政治部工作

1967年8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11月，又增补李天焕（二炮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小组成员。11月21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

应该注意的是，1967年1月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及8月该小组停止活动，都是周恩来出面宣布的。在军内并无职务的周恩来，实际一直深度地介入军队事务。调兵是他，高级干部任免也是他。这是因为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事实上是代毛泽东发号施令。

12月8日，林彪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人接见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全体人员。林彪称：“政工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林彪这个指示的意义在于，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的职责不仅仅是指导文化大革命，而且要管干部。这种安排完全突破了军委办事组“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而是把原来属于军委权限的干部工作纳了进来，且莫小看这个变化，在军队管干部就等于管住了一切。

12月16日，戚本禹、杨成武接见中直文艺系统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戚本禹宣布：“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要杨成武同志、军委办事组选几个军、师级的干部，来管文化界的事情，现在杨成武同志已经把人都调来了。一个是王宝功同志，他原来是沈阳军区空军（沈空政治部副主任）的。一个是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同志，广州军区来的。还有一个是魏宏武（21军63师政委）同志，他是二十一军调来的。今后几个样板团，就归他们来领导”。杨成武说：“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在贯彻江青同志意图下，协助工作。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负责”，“他们在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戍区协助”。（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斗批联络总站整理：《戚本禹、杨成武同志讲话》1967.12.16）戚本禹和杨成武的讲话，事实上是把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的领导权交到了江青手里。

担任政工组副组长（组长刘贤权）的刘锦平后来回忆说：“其实他主要管的还是江青交办的诸如样板团、保定胶片厂等事。”从这点上看，江青并没有插手军队其它工作。

就当时而言，这个军委政工组介入总政的只是文化方面的工作。

◇ “军管总政治部”是一种误解

军管有军事接管和军事管制两种形式。军事接管不是暂时性的措施，而是较长期性措施，是把军管单位纳入军队体系。军事管制则是暂时性的，完成任务后移交权力。

文革中不仅对地方单位实施军管，一些军队医院、院校、研究所及军属厂矿企业也实行了军事管制。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一般称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事管制小组，部分单位则是在以派驻军事代表的形式存在。

军管的内容，除特别指明只负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斗争；二是领导业务工作，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称为“抓革命，促生产”。被军管的单位，一般在军管会之下设两个工作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设立军管工作办公室，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同年11月，军委军管工作办公室撤销，军管的具体事宜改归军委办事组负责。

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时期里，没有所谓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也没有传达过以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名义下发的任何文件，所有总政治部下发的批示或文件署名都是总政治部。

1968年10月，中央军委派出“军管小组”进驻总政治部。这个所谓的军管小组只管“文化大革命”运动，各单位的管理工作由各自的行政系统负责。小组的任务，一是实现和促进归口大联合；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进行整党；四是“抓革命大批判”。

被称为“总政军管”共八人，组长由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担任，小组副组长刘江亭（原21军副军长，曾在黄永胜手下工作过），其它六人来自各大军区，都是师团级干部。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后来统一归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管。正因为此，李德生后来成为总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军建军以来唯一军事干部任职总政主任。

按照刘江亭的说法，所谓的总政“军管”主要是了解总政的“社会状况”，即人员构成情况。总政的案件和总政的群众思想反映。而且军管小组开始住总政机关，三个月后就搬了出去。借住在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

这就是所谓的军管总政。其实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由军委办事组派往总政治部的一个工作组，具体负责总政治部相关问题的审查，并没有接管总政治部的权力，与所谓的“军管”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部队经常有这种情况。当一个单位的主官或者班子出现问题，有时是上级派领导干部代理职务，有时派出工作组进驻。负责调查处理情况，以保持部队的稳定。

军委工作组进驻总政治部既没有接管权力，也没有实施具体的领导，根本不存在军事管制的问题。

虽然林彪阴谋政变和叛逃问题存在的疑点很多，在军队控制方面用自己的人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本次事件中涉及的黄永胜、杨成武、萧华、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李天佑、刘江亭、黄志勇、梁必业、刘西元、魏宏武、王宝功、刘锦平等都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出身。

从围绕总政治部斗争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是林彪体系内部以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王宏坤为主要力量的“保守派”，与萧华、杨成武等为首的总政治部“造反派”之间的较量。两派主要人物都是林彪体系，最后的结果是三个月之后成立了由吴法宪负责的军委办事组，彻底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萧华等退出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后，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与“四人帮”体系，又展开了相对“保守派”与“造反派”的较量。

总政治部被“军管”反映了军队内部派外有派，派中有派的事实。表现了文化大革命中复杂的一面。

□ 原载“文贝博客”

~~~~~

#### 【史实辨析】

文革期间总政没有被军管过吗？

• 余汝信 • 曾 鸣 •

大约十年前，本文的笔者之一余汝信在访问了亲历者刘江亭之后，写有《是谁下令军管总政？》一文，在简述了文革中总政被军事管制的过程后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

2014年，网上有文贝先生，作《总政治部“被军管”是林彪体系内部较量的结果》，在未注明出处而对余汝信该文大段抄袭后声称：“他（注：指余汝信）提出的总政治部被军管并不是事实，也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余汝信之所以编造出一个‘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源于他的固有观念，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文贝又武断地声称，“‘军管总政治部’是一种误解”，“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时期里，没有所谓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

本文为对文贝先生以上言论的回应。

## 一、军方对总政军管的有关论述

余汝信当年写作《是谁下令军管总政？》的原意，是对《李德生回忆录》有关总政军管某些说法的批评。因此，该文引述了李德生的一段话：“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本来，李德生已明确肯定了有总政军管这么一回事，但文贝先生偏喜欢较劲，声称，《李德生回忆录》等书“在‘军事管制’一词中都加了引号，说明这一用词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而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

对一个专有名词是否加引号，并不影响其本身的词义。李文中的引号，仅表明李德生给该词加上了贬义的标签，而非加上引号就可改变了其内涵。文贝说加了引号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有点不知所谓。何谓“概念”？就是将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如果没有总政被军事管制的既有事实，何来总政被军事管制的概念？更何况李德生已说“派出军管小组”（军管小组一词李并未加引号），这个军管小组到总政不实施实质性的、“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要军管小组干什么？！

抛开私人著述性质的回忆录不说（其实《李德生回忆录》亦经过官方的审定），军队官方的出版物，对总政军管有着更多的论述。

举例来说，早于二十年前出版、由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即写道：“……同年11月，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领导。1968年10月，总政治部被军事管制。1969年12月，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正式任命时间为1970年4月）。 ”

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是在全军《军史》编写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由军事科学院及全军有关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历时十三年编纂完成的。这部《军史》的第六卷提及：“1967年6月以后，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部门不断增加和扩大。到1968年，对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实行军管和派出军代表的单位达到68个。1968年10月，对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实行了不正常的军事管制。”

“不正常的军事管制”，也同样是军事管制。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至六卷出版于2011年，文贝的文章则写于2014年，这就说明，文贝先生不是一般的孤陋寡闻，写文章前根本不去查找有关资料就发表高论，只能惹来笑话。

## 二、总政军管是毛泽东批准的

1968年3月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后，吸取历史教训，对军队的调动权限、军内干部的任命权限，均重新作了明确的规定。

1968年4月26日，军委办事组改组刚满一个月，即下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中明确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

1968年5月28日，军委办事组改组两个月后，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建议并经批准：副军长、军副政治委员以上干部，报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后勤部长、师长、师政治委员，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这一规定，比1967年5月10日军委批准总政制定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大大缩窄了权限，1967年的规定是：“各军区、军种、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通过，报林副主席同意后，再呈报主席、中央，经毛主席批准后公布命令。”

鉴于有上述一系列明确规定，1968年10月间对三大总部之一的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这么一件大事，不经毛泽东本人亲自批准，“他们”（《李德生回忆录》所言，具体不知指谁）怎么敢自把自为去干？（这也是余汝信对《李德生回忆录》最主要的批评。）

总政军管究竟经谁批准，近年大陆的正式出版物终于也有了一个远比《李德生回忆录》更清晰明确的说法。这就是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其中提及：“更为奇怪的是，经过毛泽东批准，林彪等竟于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一个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竟然被军管，堪称军队发展史上的‘一绝’。由于总政的大印被封存，当时被派出执行‘外调’任务的干部，拿的介绍信竟然是以‘总政军管小组’名义开具的，使得一些接待单位（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的）都感到惊诧不已，表示不好理解。”

该书又称：“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呢？从总政军管小组传达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看法。毛泽东说：对总政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它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从这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是把清华大学看成‘文化大革命’中的先进典型，而把总政治部看成‘文化大革命’中的‘落后单位’的。总政治部既然是在大是大非中的‘落后单位’，怎么能去履行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职能呢？这大概是毛泽东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的根本原因吧！怎么办呢？‘要像清华一样’，通过军管去做工作，使总政‘赶到前头来’。”

《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一书，为原国防大学教授瞿定国、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先廷与李德生谈话30余次、“经过采访、查阅、整理、推敲、修改，耗时十数载”而成（见该书“前言”）。该书在“总政军管究竟经谁批准”这一问题上纠正了《李德

生回忆录》的错误说法（也许《李德生回忆录》中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李的本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进步。

《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的出版，比文贝的文章出现早了一年。文贝可能因偏于徐州一隅，未见过京城大著。否则，以他的本性，他是否也会质问瞿、刘：为什么编造出一个总政军管“经过毛泽东批准”？这样说，有何企图？目的何在？

### 三、刘江亭的检查和交代——不仅派驻了军管人员，还派驻了工宣队

1973年批林整风期间，刘江亭（时任军部驻陕西宝鸡的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是兰州军区和陕西省的重点批判对象。3月21日，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上指责道，“刘江亭同志在北京会议上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在毛主席身边，你失掉了这个机会。你销毁档案，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向中央讲？那时候没有讲，‘九·一三’事件以后，为什么还不向中央揭发交代？你一不揭发，二不交代，还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这些问题中央早就知道，你在北京已经失掉一个机会，这次可不能再失掉这个机会。”

1973年4月25日，刘江亭向“中共陕西省委、兰州军区党委并请转报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我的检查和交代》。这一长达1.7万字的检查交代，带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烙印，不过，也大致透露了1968年10月至1970年4月间总政军管的整个过程。刘江亭述及进入总政军管初始阶段时称：

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在对原总政的军管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施展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诡计。1968年10月25日下午，我们刚到北京两三天，林贼死党黄永胜、邱会作就在京西宾馆接见我们负责搞军管的五个人（王宏坤、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和我），给我们交了五项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和档案材料问题。在交代任务时，他们极端仇恨总政广大革命群众，向我们灌输了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革命纲领。他们恶毒地说：“总政水深王八多”“是一筐烂梨，要先倒出来再拣”“要狠揭总政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总政这个阎王殿”。他们还说：“五一三”是重大政治事件，要以“五一三”站队划线；总政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当时，黄永胜宣布：王宏坤任军管组长，原则上挂帅，刘江亭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同时还向我们交代说：“你们进总政以后，要依靠‘斗批筹备处’。”（这个“筹备处”是他们一手扶植和操纵的）后来，黄、吴、李、邱一伙在11月3日、7日接见我们时，又进一步交代要依靠那些人，他们把“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他的亲信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肖麦萍、林谦、国光等人说成是“好干部”，要我们“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同时，他们还点了一些所谓的“坏人”，并说秘书处和政工研究处是肖华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专他们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配黑班子的，宣传部的坏人很多，等等，把总政说成漆黑一团，叫我们不要相信总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进了总政，要提高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就这样，我们带着林贼提出的这条反革命路线进了总政。

刘江亭的检查交代还透露，“1968年12月12日我们到军委办事组汇报，我比较系统地汇报了所谓总政‘阎王殿’的问题和军管工作打算。黄永胜一伙听了我的汇报后比较满意，这说明我的思想符合他们搞阴谋的意图。当时，我们感到军管人员少，工作展不开，他们就确定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军管人员，从兰州军区和二十一军调六十个人和一个连队，

又从总后军工厂调二十个女同志作为工宣队，实际上是加强了在总政实行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力量。”

从刘江亭上述检查交代中，我们可以得知：不仅向原总政这一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派驻了二百人左右的军管人员，还向其派驻了二十人的工人宣传队！从这两项（尤其是后一项）完全出乎常人意料、令人惊诧不已（文贝先生至今还拒绝相信）的非常措施中，可以窥见，当日，是多么的荒唐，多么的可笑！

#### 四、军委政工组取代总政治部

余汝信在《是谁下令军管总政？》一文中，谈及了军委政工组。文贝在抄袭了大部分内容后，自行发挥称，“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介入总政治部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知半解就发议论。军委政工组与总政的关系，军方的准确表述为“取代”而非文贝所说的“介入”。军委政工组成立前，总政治部已然瘫痪。军委政工组于1967年11月21日经毛、林批准成立，宣告总政作为一个机构已不复存在，军委政工组部分（并非全部）担负起总政原来的职能。

1968年1月至1969年12月整整两年间，总政治部的身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更遑论如文贝所称有什么以总政名义下达的批示或文件署名！

军委政工组的全称，为“军委政治工作小组”。1967年12月8日，林彪在和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时称：政工小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实际上一个是解决思想问题，搞好思想革命化，一个是解决组织问题，搞好组织革命化。事情千头万绪，处理不完，你们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1968年1月30日，军委办公厅以军委（68）1号文件印发1月19日《军委批转军委政工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政工组的报告“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项建议：“一、以最大的决心、最强的毅力、最主要的精力，狠抓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认真考察和熟悉了解干部，正确使用干部，配好各级领导班子。”“三、加强对解放军报社的政治思想领导，帮助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报社的建设。”“四、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加强对文艺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树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五、指导总政治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帮助总政治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好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坚决斗倒斗臭总政治部机关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上述第五项工作，在总政军管后，实际上已移交军管小组履行。

《报告》又提出，“根据林副主席指示，政工小组的主要精力是抓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熟悉了解干部这两项中心工作，为此，部队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工作，主要由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总部的政治机关负责进行。”

文贝先生可能没有看过这个报告，在文章中说什么“就当时而言，这个军委政工组介入总政的只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文艺工作只是军委政工组取代总政后的五项工作之一。

## 五、总政军管的“确凿证据”

文贝先生声称，总政军管一事，“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一般法学意义上的证据，指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至于史学范畴的证据要素，我们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唯认为本质上与法学意义上的证据应大同小异。

这样，如果我们在论及总政军管的证人证言时，我们已经知道，已存在有亲历者（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刘江亭的《我的检查和交代》、李德生的《李德生回忆录》等。

书证，我们可以举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和《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等等。

至于物证，即一般最为重视的实物证据，因为事隔四十多年，而文革时期的官方档案（尤其是军方档案）又不开放，加上总政军管主要功能在于对内（原总政机关干部），寻找起来的确有些难度。但总政军管毕竟有两年时间，怎么都会留下些蛛丝马迹。这样的物证，恰好我们手头上就有一份，这就是以总政军管小组名义发出的一份“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

这份外调介绍信，是将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介绍信的署名，用笔将“直属政治部”划去，改为“军管小组”，以旧物利用的。该介绍信如下：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

直政第007711号

中国舞剧团革命委员会：

兹介绍郭荣兰 夏静寒同志系中共正式、预备党员前往你处通过组织了解反动组织“5·16”的有关问题，请接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管小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介绍信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管制小组调查材料专用章”红色印鉴。

可见，文贝“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断，下得太过轻率。事实证明，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最为稀罕的实物证据）即便在民间也是存在的。文贝先生没有见过，不等于就没有这样的证据。当我们把确凿证据拿出来后，不知对文贝先生主观武断的学风、文风，是否多少会有一些触动？

（相关简介：余汝信，独立学者；曾鸣，历史研究者。）

□ 原载《领导者》总第64期（2015年6月）

~~~~~

【史海钩沉】

把文革中的农民记入历史

• 徐 星 •

4月2日，北京大屯的家中，作家、导演徐星展示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

历时三年多的寻找、拍摄、剪辑，这台电脑帮徐星完成了135分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历时三年多的寻找、拍摄、剪辑，这台电脑帮徐星完成了135分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

◇ 对话动机

作家徐星变成了导演徐星。

22张37年前的“犯人登记表”让徐星拿起了摄像机。去记录文革中农民的烙印。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在杭州放映会的展板上，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 人物简介

徐星，58岁，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等。

今年，徐星完成了最新纪录片《罪行摘要》，讲述文革期间浙江地区十余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

◇ 冲动

新京报：你为什么想到拍成纪录片？

徐星：看到那些登记表后就被它吸引，当时特别冲动，觉得应第一时间就去找这些人。

新京报：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张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这些人都是农民，这是命运的东西。

新京报：为何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徐星：这是历史态度问题，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新京报：经历过文革，看到登记表，拍成纪录片，这就是命里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国后，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受的这些教育，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

徐星：有想过，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但可能会有本书，“nonfiction”，非虚构写作。这个得等一等，在我有体力时，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使劲儿拍。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但是拍的话，要是不赶快去做，这些老人就没了，特别可惜。

◇ 寻找

新京报：时隔多年，单靠这些表格，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徐星：到处问，大的地方没变，但具体到乡、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红旗什么的。我先问岁数大的人，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再去找人，反正在农村，都还知道。

新京报：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个“现行反革命”的资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有的人后来没找到，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最后选了12个。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但我也采访了，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

新京报：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哪些？

徐星：片子里的人当年的罪名看起来很可笑，比如“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等等。当时，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

新京报：最重的判了多少年？

徐星：一个叫林品新的人对文革有疑问，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事人周明夫，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新京报：找到他们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徐星：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新京报：他们在回忆时，用得最多的词是什么？

徐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 感受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愿意对着你的镜头回忆这些？

徐星：我自己就是底层的人，无车、无房、无工作、无保险，很容易和他们亲近。另外，我是第一个专门去和他们聊文革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别人说起过，有的是自己都没想过。有的也可能是没人可说。

新京报：采访中，面对那些老人，你哭过吗？

徐星：哭过，但我要克制自己，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们，影响他们。我没有嚎啕大哭，眼眶湿了。那是当我拍完，拿着机器往回走，离开他们的时候。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新京报：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 思考

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新京报：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 意义

新京报：从镜头里看，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

徐星：就我自己，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个助手，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

新京报：拍这部片总共花了多少钱？

徐星：拍了三年，共花了18万多，没细算过，有一部分钱是朋友赞助的。

新京报：拍纪录片时想过要靠它赚钱吗？

徐星：拍这些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过盈利，也不可能有。我省吃俭用，当然温饱得有，穿衣服不能露着屁股，得有饭吃。我不太买什么东西，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烟。

新京报：拍摄中最困难、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徐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最累时，江南很潮湿，我住的都是小旅馆，连出租车都不敢叫，就坐农民的摩托车，在后面加个斗篷，两根杆子撑着，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岭，还得背着40多斤重的器材。

新京报：在最疲惫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

徐星：我就想，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们不做，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

新京报：你觉得做这件大事的意义在哪里？

徐星：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为了解释灾难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讲人的故事。摄像提供了新的记录历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过去历史都是由专门的“史官”记录的，摄像让普通人也能记录历史，我现在记录下的这些，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意义就在这里。

新京报：现在有人称你是作家导演，你觉得这会让你有成就感吗？

徐星：这些头衔我完全就不在乎了，没时间想那些事儿。出多大的名儿对我没有吸引力，构不成任何驱动力。如果为了名我没必要做这事，就享受那个《无主题变奏》就可以了，那个也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在大学文科的教材里。现在我就完全由着自己，凭着冲动去干事。干完之后，能得到朋友的认可，我就挺满足的。

□ 原载《新京报》2014—04—14

~~~~~

## 【拒绝遗忘】

### 清华武斗期间的两件亲历事

• 高晋占 •

在文革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1966年—1968年两年多的时间中，公检法已经砸烂，原来的行政体系不复存在，新的行政体系尚未建立，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人们起号召作用的往往是最新最高指示、首长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之类。伴随文革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其领导和组织作用往往是松散的，对其成员很难形成严格和刚性的组织约束。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似乎每个人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往往是本人的良知、行为习惯和处事准则指导着每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那是一个人的本性大暴露的时期，被文革的棍子一搅，沉积在意识深处的善或恶纷纷泛起。那时有暴力，有血腥，也有温情和友谊。

本文记述在清华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武斗期间亲历的两件事，虽然艰难曲折，也是率性而为。既然做过，就记录下来，是耶非耶，留待后人评说。

## 一、乐器历劫记

1968年4月底，经历了文革动乱近两年的清华，又爆发了武斗，之后武斗队开始攻占学生宿舍和食堂，清华局势骤然紧张。为躲避武斗，也为生活所迫，清华的师生纷纷出逃避难。通往几个校门的路上，到处是肩背手提着行李仓皇出逃的人们，一片兵荒马乱的逃难景象。

1号楼和2号楼已经被武斗队攻占了，我所住的13号楼也即将成为攻击目标。我的出逃更为困难，因为当时我是一个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乐队的民族乐器都由我管理，宿舍里堆放着大量乐器，最重的是一架扬琴，还有琵琶、二胡、板胡、阮、各种吹奏乐器、打击乐器……。这些都是国家财产，都是乐队的命根子，因为没了乐器的乐队就像没有武器的军队一样，会无所作为，绝对不能弃之不顾。

紧急中赶忙找来几位同学帮忙，大家七手八脚，把所有乐器搬出宿舍。几件没有包装盒的小件乐器，包括一把唢呐和两把老式笙，实在拿不了，只好藏到抽屉深处，再加上一把锁。所谓抽屉，其实是不能抽的屉，就是在桌面下的扁膛前面安装了一个可以向下翻动的合页门，这是当年清华学生宿舍标准配置的桌子。

回头看一眼，自认为坚壁清野做得不错，就是鬼子扫荡来了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何况要来的毕竟不是鬼子，估计不会有什么损失。读书人总应该有点节操，有点清高，总不至于撬锁吧？总不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吧？情况紧急，赶忙锁了房门，招呼几位同学，肩扛手拿一堆乐器匆匆而去。

我想错了。

经过文化革命的棍子一搅，人性底层中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被搅了起来，什么不合情理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宿舍中留下的少量乐器和一些生活、学习物品，在劫难逃了。

同学们帮我把乐器搬迁到北京林学院，找到一位我的中学同学，他因为得慢性病，单独住在一间病号房里，是在林学院的7号楼，这里就成了这批乐器的避难所。那么一大堆乐器，从清华13号楼搬运到林学院，没有任何运输工具，连辆手推车都没有，全靠人力搬运，沉重的乐器把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好不容易搬运到目的地。兵荒马乱，不可能招待这些帮忙受累的同学，实际上我也没有招待的能力，唯有一声发自内心的“谢谢”作为辞别。

民乐队的老队长马XX担心着这批乐器的安危，他匆匆赶来，看到这些乐器已经转移到这个安全地方，一脸欣慰。他是吹笛子的乐手，特别打开盒子查看了笛子，各种调门的笛子一支不少，向我竖起大拇指。

看到老队长如释重负，我也很高兴，于是提议：“很久不曾演奏了，咱们过把瘾吧。”老队长欣然同意，他吹笛子，我吹笙，合奏了一曲“五梆子”。沉浸在乐曲的优美旋律中，忘却了被赶出学校的不快。一曲终了，楼窗外驻足聆听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夹杂着叫好声。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看样子是位老师。我心中一惊：我们演奏的可是文革中禁演的“封资修黑货”啊！但愿这次尽兴别惹来麻烦。不料来人问道：“刚才的曲子是哪个电台播放的？”当他得知是我们演奏的而不是收音机播放的，茫然若有所失，喃喃地说道：“水平真不错。我还以为是电台播放的，文革形势变了呢。”他的奢望落空了，而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工宣队进校后，回到13号楼的宿舍一看，房门被撬开了，抽屉被撬开了，藏在抽屉中的几件乐器被盗走了，满屋狼藉一片，所有书籍和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劫掠一空。

局势稳定后，我把转移走的乐器全部搬回，交还给学校音乐室管理乐器的老董。对于被劫掠走的几件乐器，说明了情况，办理了相关手续，还签字画押以便承担责任。我没有能够把所有乐器都保护好，心有愧疚，要赔偿要处罚还是要做其他处理，我都认。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小伙子来找我，自称是数学力学系学生，看看并不认识。他毕恭毕敬地说：“听说你唢呐吹得不错，可以教我吗？”在几年动乱之后，还有人愿意学乐器，说明人们没有丧失对美的追求，这是好事。赶忙回答说：“当然可以。”又问：“你有乐器吗？”他一边说“有，有。”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一把唢呐。

我的眼前一亮，这正是我吹了多年的那把心爱的唢呐，不幸在清华武斗期间被人盗走。1964年10月，在清华大礼堂前面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吹的就是这把唢呐，还被记者摄影，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记录影片《伟大的胜利》中，留下了将近十秒的特写镜头。几年来我带着这把唢呐到处演出，北京和天津的主要舞台都曾登台表演过。这把唢呐，我就是闭上眼睛都能摸出它来啊。想不到这把有着学校编号、有着历史记录的唢呐，却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

我强忍怒火，问他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决心拜师求艺的小伙子一脸虔诚，如实回答。正愁抓不到贼，贼却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而且还带来了脏物。人赃俱获，来历已经查清，休想逃脱。我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唢呐是你偷来的！主人就是我！”对方大骇，面如土色，一脸惶恐，眼睛瞪大了，连嘴巴都张得大大的。我又喊道：“和唢呐一起丢失的还有两把笙，交出来！”对方手足无措，恨无地缝可钻，说话也结巴起来：“不…不知道。我就拿了个唢呐…别…别的…真的不知道啊……”

看到他一副可怜相，我在犹豫：要不要向工宣队告发他？我想起中学的一位同学，他是公认的全班文科第一，高考后却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只好回家务农。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曾经偷过同学的两块钱。在那个年代，这种事一旦记录在案，再装入档案袋子，会把人压得一辈子不得翻身。

如果我告发他，他的一辈子肯定就毁了。他还很年轻，如果毁在我的手里，于心不忍。而且，他想学乐器，还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估计也坏不到哪里去。愿上帝宽恕他吧。

我做了一次好好先生，留下唢呐，放他走了。希望他良心发现，记住这次教训，以后不要再干坏事了。

这把心爱的唢呐，历经劫难，终于又回来了，之后又伴了我多年。

## 二、枪口下的人质

1968年7月1日，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科学馆者格杀勿论。7月5日，驻守科学馆的电机系零字班同学杨志军被埋伏在地堡中的枪手开枪击中。枪弹打穿了颈动脉，鲜血喷涌而出，不一会儿时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亡了。

同学加战友死于非命，悲愤之余，应该给家长通风报信，说明情况，商讨如何处理后事。但是如何把杨志军的家长接来北京却成了难题。

杨志军的家乡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安国县，那时节保定地区的武斗打得很凶。保定地区的百姓尚武，民间素有习武风气，杨志军也不例外。民间传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勾腿子就是保定练武的一种著名招数，是下面勾腿上面推搡撩倒对方的狠招，后来误传为“狗腿子”。在科学馆西面的空地上，曾经看到杨志军练过一套武术拳脚，一招一势有模有样。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百姓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奋起反抗侵略者的暴行，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都是发源于这个地区。

当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武斗，派战双方都喊着江青提倡的“文攻武卫”口号与对方交战，双方都号称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保定地区发扬光大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和经验，把武斗打出了高水平，早已动枪动炮，使用的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已经升级到打阵地战。文革中当地驻军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另一派，由文斗逐渐演变为武斗，不久就抢部队仓库的武器，往往名义是抢，实际是送，所以武斗队的武器精良，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小钢炮应有尽有。

安国县最能打的武斗队叫作“八一战斗队”，成员多为退伍或复员军人，三个总指挥只有两条腿，都是残废军人，其中的一位两条腿都截肢了，其余两位幸运，只截了一条腿。他们过去都是革命军官，据说都是团级，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战斗经验丰富，文革中指挥武斗也打得有声有色。在近二十年的和平生活之后，他们又过了一把打仗的瘾。

到这种地方去找人，凶多吉少。因此，对完成接人的任务，杨志军所在电机系的同学感觉很为难。我和杨志军熟悉，音容笑貌记忆犹新。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现在人都死了，总应该给他的父母有个交待。我的家乡也在保定地区，和杨志军可以算半个老乡，只是他的家乡在定县（现在的定州）东面70里，我的家乡在定县西面200里，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交通、地方口音和土语比较熟悉，于是自告奋勇，要去接人到京。

在焊接馆前，一位不知姓名的女老师（或高班女生）给了我10元钱用作路费，并告诉我“杨志军”是他到大学后才使用的名字，家乡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原来的名字叫杨占勇。事情紧急，晚饭后匆匆出发，赶乘半夜从永定门火车站开往太原的列车。途中会有什么艰难险阻，考虑得不多。

去安国县必经定县，而定县和安国分属当地的对立派别，因为武斗，两县之间的公共交通早已断绝。坐火车约5个小时，到达定县车站是清晨5点左右，下车后，剩余的70里路程只能步行。好在从小练就了走路的本事，70里路不在话下。太阳出来后，七月初的天气已经很热，骄阳似火，走得我浑身冒汗。辽阔的华北平原一望无际，路边茂密的庄稼地让我想起抗日战争炮火下的青纱帐。边走边问路，还算顺利地找到了杨志军所在的村子，之后问到“杨占勇”的家。

那是一座华北地区普普通通的平顶土坯房，屋里比较暗。杨志军的父母都在家，他的弟弟杨占欣当时正在师范学校读书，文革闹得不能开课，也在家。首先向他们出示了我的学生证，说明是杨志军的同学，告诉他们我很渴很饿。之后喝了一大碗水，吃了几个现成的贴饼子。饼子是黑色的，是白薯面掺加树叶或菜叶做成的。

按照老师和同学的嘱咐，不能说杨志军已被打死，只能说被打伤了。否则父母悲痛欲绝，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更不可能顺利接来。杨志军的老母疾病缠身，脸色很不好，听说儿子被打伤就哭起来了。我既为自己撒谎感觉不自在，也为老人家的哭声感觉心酸。

杨志军的父亲当时在生产大队（或公社）当干部，看起来见过一些世面，考虑问题深思熟虑。在商议如何来京时，他思考半晌，主张不要一起走，路上兵荒马乱的，万一被对立派扣留，一个都走不了；而且，杨父还是当地一个派的基层骨干，担心到了对立派的地盘中很难通过，定县火车站也被对立派把持着，一旦查明杨父身份难免发生不测。他主张我和杨占欣先走，到定县城会合杨志军的嫂子来京；杨父单独在夜间通过危险地带，寻找其他安全的车站上火车，到北京会合。杨母身体不好，在家看家。我觉得有理，立即同意。

我和杨占欣出发奔定县，他路途熟悉，走得很顺利。走到两县交界处，记得地名似乎叫五女寨，这里也是两派地盘的分水岭。只听附近有枪声和爆炸声，似乎是在交战，我们糊里糊涂闯进了人家的战场。

正在犹豫，几个彪形大汉持枪截住我们，押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问我们有没有他们这一派的路条，没有路条就有刺探军情之嫌。他们的举动让我想起了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团员拿着红缨枪查路条，不过这里是戴着红袖标的造反派，手里拿的是真枪实弹，更不可等闲视之。我说明了情况，并出示了自己的学生证，还说了一些希望他们同情伤者家属的话。对方不为所动，对学生证看了一眼就说“谁知是真是假！”总之，没有路条休想通过。

问清了他们是哪一派，谢天谢地，原来和杨父是同一派。对方不相信同一派的说法，只认路条，尽职尽责。没办法，只好返回去开路条。对方的警惕性极高，担心我们会溜之大吉，放走了奸细非同小可，提出要把我扣作人质，由杨占欣去开路条。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只好如此。

杨占欣走了，屋子里留下两个小伙子，手里拿着驳壳枪看押我，不许我乱说乱动。经过长途奔波，我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又累又困。猜测他们不至于不问青红皂白就处置我，一直信奉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又在脑海中闪现，心想老子不妨借此机会歇一歇。斜眼看到屋子里有几个方凳子，于是拉过三个方凳排成一排，向上面一仰就睡着了。

大约四个多小时后，杨占欣终于带着路条回来了，我的人质生涯也宣告结束。之后又走了几十里路，夜里到达定县火车站。杨志军的嫂子当时在定县供销社上班，离火车站不远，找到她后顺利地登上了火车。火车走走停停，五个多小时后才到达永定门火车站（现在的北京南站）。嫂子在车站找了一个电话亭给杨志军的哥哥打电话，他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位连长，驻扎在北京的东官房一带。我不知道他们在电话中谈什么，只是眼睁睁看到她听着电话眼泪就流下来了，心想一定是那位大哥已经知道了死讯。

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去东官房，还是到清华，他们主张先去东官房。家中祸从天降突遭变故，杨父尚未到达，这时杨志军的哥哥无疑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于是把他们送到东官房，我赶回学校向头头们汇报情况。

我的接人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清华园里的悲剧并没有结束。

7月18日中午，钱平华同学途径主楼前回校，被9003大楼上的老团枪手击中。大家冒着枪弹把她抢救回来，放在焊接馆一楼的一个大实验桌上。我看到她面色苍白，两眼紧闭，呼吸急促，担心她的肺被击穿了。老四们很快叫来一辆小吉普车，送她去北医三院。我看到吉普车冲出主楼过街楼后，为了躲避老团枪弹，随即向北拐，绕行到中央主楼背后再向东，拐弯时不但不减速反而加速，拐弯速度之快再也不曾见过，当时直担心千万别翻车。

北医三院的医生们多方抢救，但无力回天，又一个鲜活的花季青年死于非命。

作者：高晋占，生于1946年，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并留校。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难忘岁月】

5·30难以忘怀的碎片记忆

· 高子正 ·

四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了百日大武斗。那是一段我一再希望忘掉但却刻骨铭心的日子。

由于年代久远，本人又得过重病，许多情节已经是模模糊糊，记不起来或者记不清楚了。但是，有那么几件事情，本人还算是记得清晰的。

一、铺垫

清华园内两派的武斗始于1968年的4月23日。当时，我和其他同学根本没有参加武斗的任何想法。那天听说，老团向老四开战，进攻的是旧电机馆，我们就去看。

在侧楼的窗口，看到几个老四被里面的人追得没有办法，从三层楼的高度跳窗而逃。其中，有两个人都是先放下绳索，然后人拉着绳索向下跳，但是，绳索却承受不住人体的整个重量，立刻就断了。人都直接掉了下来。摔得很惨，口吐鲜血，被抬走了。

唯一的那个人，叫做陈成安（动农系燃9班，校短跑跨栏队员），与众不同。他站在了窗台上，直接向附近的一个平房的屋顶上跳。跳到屋顶，由于有冲力，站不住，跑了几步，然后直接跳到了地上。站稳后，他拍拍身上的尘土，就溜达着走了。现场的观众，包括老团，都为他鼓掌。

至于为什么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会参加武斗，会犯下自己也后悔的错误？除了当时一腔热血，以为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以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听信“文攻武卫”的口号。

我周围的同学，参加武斗者，多数是原先的班级和团支部的骨干，两派差不多。不少人是弱不经风，骨瘦如柴。而我自己，不怕大家笑话，基本上属于“书呆子”，“笨得像一只狗熊”。再有一点，我周围的同学有一种说法：老团会和老四真的打？不可能；同学怎么会

和自己的同学厮杀？只是，谁都认为自己那一派正确，希望中央表态支持自己。和平时期的武斗，可能像拥有原子弹一样，谁都不敢轻易使用；可是，谁都想拥有。事情的发展导致我们不少人不好意思说从此退出……

二、老团的一次挫折和许恭生之死

在我的记忆里，我所属的队伍属于“二线”，是保卫据点的，很少“出战”。许恭生是冶金系焊8班的学生，校运动队队员。听说，他还是北京市高校运动会“重剑”冠军，他自然成了我们的教练。

许恭生曾经教我们如何使用自制的长矛。他自己像一个儒将，白面书生，不像后来电影里的霍元甲，而像《叶问》的电影演员甄子丹。我模模糊糊记得，大家学习使用长矛的时候还问：如何刺中对方而不至于过度伤人？答案是刺屁股。大意是说，你打败了对方，趁对方逃跑的时候，刺一下对方屁股……大家不由得大笑起来。

5·30那一天，我们接到任务（可能是打援；更可能是侦察，记不清楚了），由许恭生带领约十几个人出发。但是，许不是走在最前面。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老四武斗人员，大约30多人，瞬间便冲到了我们的跟前。走在最前面的L君边打边退，不慎摔倒在地，两个老四举起长矛向他刺去。正好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赶到，将其击退。L君得以重新站起。老团多人喊：快撤！而这时的老四，显然目标首先集中对付的是许恭生一人。当我转身向后“逃跑”的时候，正好看到在不到5米远的地方，许恭生向后慢慢地倒下，身体与地面成40度的倾斜角度，老四的十多根长矛一起向他刺去的场景，那是一个“铭刻在脑海里”终生难忘的“画面”。显然，许恭生是有意掩护大家撤退，才走到了最后面。我心中一阵颤抖和剧痛，但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跑了一二百米，遇到了团派的另一支队伍，约50多人。我们求救；他们立即直追，打退了刚才那批老四。我看到，5到6个人，抬着拽着许恭生向回跑，许的头盔掉了，脸色煞白，四肢无力地耷拉着，鲜血一股一股地流着撒在地上……

后来，我听说，许恭生被长矛刺中大腿的动脉，流血过多，当时就没有救了。

李自茂在他回忆5·30的一篇文章中说，许恭生穿的是专用刺杀服。是否有误？我不敢肯定地说，许恭生穿的和其他人一样；主要是，我不记得有什么“专用刺杀服”。当时，其他参加武斗的人员，穿的都是自制的“盔甲”：用航空合金铝板制成，制成贴近人体的形状。内部分成几大件，正面的胸部是一大块；左右上臂，左右手臂各一；左右大腿部各一块；左右小腿各一块，外面再穿上工作服。这种装备，能够抵御长矛的攻击，刺不穿透，而只是打击出一个小坑。所以，人在正面相互格斗的时候，应该没有大的伤害；但是，一旦跌倒了，再使用长矛去攻击的时候，即使只刺中腿部其他部位，也可能顺着铝合金板滑动；而防护板之间的空隙，就容易成为被攻破的地方。

战斗结束后，L君到校医院看伤。大夫说，被刺中咽喉要害，擦破了一点皮；如果再多一两毫米，兴许就有生命危险了！

当天夜里，团派为许恭生的遗体武装守灵。我和另一位团派人员是夜里12点的那一班。夜阑更深，寂静无声；只有微弱的烛光，映照着许恭生那年轻英俊却惨白僵硬的面

庞……我不由得万分悲痛；同时，反反复复的思考着：同学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激烈的残杀？

三、浴室攻坚战和人群的三次惊呼

我不知道老团偷袭浴室的情况，只是记得，进攻不顺利；有人来求我们去支援。我只记得那个外号叫做“大象”的。在失去许恭生之后，我们这边的老团似乎有点群龙无首，加上“大象”受了伤。攻楼的那一刻，几乎都是自觉自愿上的。我的记忆，是在从相邻的饭厅平房的房顶，架上梯子，向浴室屋顶开始进攻。

我和另一同学先登上梯子，他最先，我第二。浴室虽说只有二层，但是，高度相当三层，有近10米高。我们两人很快登到梯顶，站到了浴室的屋顶边缘上。当时，老四在屋顶只有一个人。我们两人与之用长矛搏斗。下面的人喊：攻上去了！但是，那个铁栏杆挡住了我们的前进。铁栏杆不高，1米多；但是，跨越不过，尤其是在有人阻挡的时候；铁栏杆分成二层，中间的那一层，又使人不能钻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有的老四跑出来增援；而楼下的老团，以为我们是遇阻无法前进，便一个个奋勇登梯，全然不考虑梯子的承重能力……

我只记得，忽然一声巨响，一阵尘烟，耳边响起群众的惊呼声；自己觉得脚下一沉，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时间，我突然清醒过来，才知道梯子断了，大约10个老团都掉下去了；而只有我一个人，双手抱住一根摇摇晃晃的木柱，悬在近10米的高空。人群中又是一声惊呼。（当时观战的人群，大约有二三百人）往下一看，眼中一阵眩晕，甚是惊险；我定了定神，抱住木柱，顺势溜了下来。人群中，又响起一次惊呼。我看了看，自己身上无伤，只是手上（戴着线手套）扎了几根木刺。

又过了七八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有人指着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人问我：“你认识他吗？他也是你的校友。不过，他是和蒯大富对立的，什么四一四派的；据说，他在一次武斗中，打败了团派的七八个人，都从梯子上掉下去了……”。我定眼看了看，那是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娃娃脸，微微的笑着；言谈之中，掩饰不住才华横溢的气质。我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如果有人问我，你今天对此问题的感想是什么？我想，最直接的想法是，第一，我后怕，再也不会去参加这种武斗和进攻了。我曾经设想，如果，如果梯子早一分钟塌断，而我和另一位同学没有随着梯子同时掉下，那么，继续站在浴室的屋顶边缘，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会是一个什么结局？毫无疑问，那就绝没有我今天的“闲聊”啦！反过来，如果没有那个铁栏杆，或者梯子没有塌断，十几个老团陆续登上屋顶，与一两个或者七八个老四在屋顶决战，那又会是怎样的激烈和惨状？

而第二个想法是，绝不能再与自己的同学战斗。我反而很庆幸有了那个临时焊上的铁栏杆。老四可能以为它是抵抗团派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我则想到，正是因为这个栏杆和倒塌的梯子，才避免了5·30更加惨烈的结局。无论老团老四，都是属于当时的“红卫兵”，没有人认为是敌我矛盾。为什么会采用那么激烈的办法来解决不同意见的分歧呢？

四一四著名的理论家周泉纁，在他的新书里，曾经分析过清华大学那100天的武斗，并且从“老团”的角度提了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建议。本人从不是理论家，无法从另一个角度做更深的分析；但是，在我看来，四一四派最可圈可点的，不是事先可能知道团派的计划，也不是连夜制作了起了重要作用的铁栏杆；而是在团派采用火攻的情况下作出的二十几

个人“放弃抵抗”“投降”的决定。这种以人的生命为重，避免四一四派学生和团派学生在“内战”中作出无谓牺牲的事情，国外比较常见；而在国内，却容易被认为是“背叛”、“懦弱”、“可耻”等等。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勇气。

清华园，我心中挚爱的清华园啊！美丽迷人而又浪漫的水木清华啊，你是多少莘莘学子向往的神圣殿堂？！这里不光有现代化的教学大楼，有着优良的教学传统和著名的教授以及众多成功的人才，有着数不尽的光环；也有在那特殊年代，那疯狂而又荒唐的一幕幕场景。这就是历史！是人们总希望忘记，然而又无法忘却的历史……

我虽然已经熟练使用计算机打字输入文章，但是，写此短文，却常常不得不停下来，抹去眼中的泪水。作为幸存者，我们还可能为生活中的种种不快之事而烦恼和抱怨。但是，许恭生们那些冤屈的灵魂却什么也不会说了。和唐少杰教授不同，他们是以学者的身份，认真研究史料，冷静地思考总结历史；而我，真的感觉不是在打字，而好像使用自己的双手，沾着泪水和血水去写下一个个文字，写下那段历史的点点滴滴……

本文只写了我亲历的一些事情，不是什么反思或者详细分析。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最后，引用当年上海红卫兵领导人之一的安文江，在解剖自我的回忆录《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中说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红卫兵不是天兵天将，也不是妖魔鬼怪。我们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的宣传教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被兽化的孽种！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对人斗人怖惧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所以，我提出“红卫兵理当反省，但该忏悔的是我们积垢厚重的民族。”

他说的对不对？我将会与大家一同深入思考下去……

发表于：2009 年 2 月 23 日，修改于：2013 年 9 月 3 日

作者：高子正，天津市人，生于1945年。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为精密仪器及机械系（现“精仪系”）制91学生，1968年毕业。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